

# 维·马·日尔蒙斯基的历史比较文艺学研究

吴泽霖

(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 北京 100875)

**摘要:** 维·马·日尔蒙斯基是苏联历史比较文艺学派创始人。本文研究了日尔蒙斯基的理论探讨过程, 阐述了日尔蒙斯基关于历史类型学的观点, 国际间文学相互影响的观点和民间文学方面所进行的历史比较研究。

**关键词:** 日尔蒙斯基; 历史比较文艺学; 历史类型学

**中图分类号:** I109.9

**文献标识码:** A

维·马·日尔蒙斯基(В.М.Жирмунский 1891—1971)是苏联当代著名的文艺学家, 苏联科学院院士。他继承和开拓了俄国维谢洛夫斯基历史比较文艺学方法的有益经验, 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比较文学研究中, 成为与西方比较文学思想方法不同的新学派——苏联历史比较文艺学派创始人。或许他的理论建树有着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 但是正是他把具有悠久传统的俄国维谢洛夫斯基历史比较文艺学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他通晓多种语言, 著有许多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方面的论著, 特别是在诗学、民间文学、东西方文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

## 1 维·马·日尔蒙斯基的理论探讨和苏联历史比较文艺学的奠立

应该指出的是, 在十月革命前后一个时期, 对文学现象进行历史比较研究这一方向的发展是不景气的。比如历史文化学派将各民族文学的联系视为国际间种种流行思想的消极借用, 而无力阐明在文学中这种影响的特性; 语言学派则忙于大量收集个别性的“平行”或“借用”等外在相似性的事实, 而不去揭示其规律性和思想意义。

日尔蒙斯基在十月革命之后便开始了自己的探索。20年代和30年代, 他发表了一系列著作, 为历史比较文艺学新的方法论原则的建树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尽管维·马·日尔蒙斯基自20年代初就趋向于历史比较方向的研究, 不过一开始他采取的是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从他的一些研究著作, 如《抒情诗之结构》(1921), 《韵律, 它的历史和理论》(1923), 以及他的博士论文《拜伦和普希金》(1924)来看, 日尔蒙斯基还没有从当年最风行的俄国形式主义流派中分化出来。如在《拜伦和普希金》中, 他为了绝对客观地解决问题, 而把研究的目光仅仅局限于所谓文学的内在因素上。他指出, 应该直接研究作品本身, 而对于“影响”, 他仅仅是从诗学方法的传统意义上加以理解。社会的、思想的、个人履历方面的诸因素在这一研究中都未涉及。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一研究中, 日尔蒙斯基用具体事实证实了这样一种思想: 对影响的接受不是消极地把握, 而是通过积极的改造, 甚至是斗争, 来创造出自己的艺术个性。

经过了长期的理论探索, 日尔蒙斯基在1935年所作的《比较文艺学和文学影响问题》这一报告中, 才第一次提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决定文学历史过程的统一性的观点。他指出: “按照这种观点, 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把在社会历史发展同一阶段上出现的相似的文学现

象加以比较,不管这些现象之间有无直接影响。”“比较应当成为揭示与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文学现象规律性的一种方法。”由此他提出类型学的方法。他还指出,苏联比较文学的目的和任务就是根据世界历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建立“总体文学(всеобщ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这一报告标志着在经过长期探索之后,日尔蒙斯基终于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于俄国传统的历史比较方法,对于苏联历史比较文艺学方法论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奠基性的意义。他自己也认为,这是他科研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

在此基础上,日尔蒙斯基 30 年代还发表了学术专著《俄国文学中的歌德》(1937),《普希金与西方文学》(1937)。在这些研究中,他把注意力特别集中在对借鉴的创造性改造上。他指出,普希金和过去的文学、和当代西方文学之间复杂的关系是由普希金参与其间的俄国文学的发展进程,是由普希金所描绘的俄国社会现实历史所决定的。日尔蒙斯基正是在这种复杂的相互关系中,勾画出普希金作为诗人的个性特征及其创作的民族特点。同时,他也指出,对于歌德,就像对于所有外国作家一样,在借鉴其作品时创造性的想像和改造不可能是没有限度的。其限度就是“由作品和作家的为历史所制约的客观独特性”。这样,就同时否定了一些比较文学学者的可以主观随意地接受外族文学的观点。

在奠立苏联历史比较文学方法时,日尔蒙斯基指出维谢洛夫斯基是自己最直接的先行者。1940 年,他主持编注的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比较文艺学经典遗著《历史诗学》出版了。他在长篇序言中,系统地阐述了维谢洛夫斯基历史比较文艺学的精髓,也指出其固有的弱点。他说:“维谢洛夫斯基没能展示出文学发展过程在其所有阶段上的规律性,没能建成作为科学的文学史的宏伟大厦。其失利的原因不是偶然的,它存在于维谢洛夫斯基这位具有实证主义理论原则教养的学者的全部学术创作的方法论前提之中,他试图通过自己那种历史归纳法,从偶然到偶然地,不要任何哲学和美学前提而揭示社会历史和文学过程的普遍规律。”(М.Жирмунский 1979: 135)最后,在指出苏联历史比较文学的方法和维谢洛夫斯基历史比较文艺学的继承关系时,日尔蒙斯基说:“苏联文艺学的任务就是要举起从这位伟大的学者手中落下的旗帜,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历史过程的全面理解和对文学创造特点的认识,把他所开创的工作继续下去。”(М.Жирмунский 1979: 136)

应该指出,日尔蒙斯基初期对于文学影响问题的讨论往往表现出当时苏联文艺学中风行的把文学现象仅仅作作为一般意识形态,而忽视对文学影响的特殊性的研究的弱点。他在之后的研究中逐步克服了这种“社会的直线性”,而注意分析影响文学的诸种民族历史因素和文学现象的特性。

日尔蒙斯基在 40 年代,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阐述自己的历史比较文艺学思想。如《作为比较文艺学问题的东西方文学关系》(1946),《试谈东西方文学关系问题》(1947)。但是,苏联历史比较文学方法的发展道路是不平坦的。40 年代后期,由于苏联“左”倾学术思潮的泛滥,以及对所谓“世界主义”的批判,比较文学被视为反动学科而遭到禁止。日尔蒙斯基因其著作中谈到俄国作家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而被放逐,维谢洛夫斯基也受到批判。

直到 50 年代中期这一学科的活动才有所恢复。日尔蒙斯基、维谢洛夫斯基得到平反;1957 年 1 月 11 日,苏联科学院决定在列宁格勒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创立“俄外文学关系研究室”。1958 年日尔蒙斯基得以出席全苏民俗学会议和第 4 届国际斯拉夫学者会议,并分别作了题为《民俗学的历史比较研究》和《斯拉夫民族的史诗创作和史诗的比较研究》的报告,这对于苏联历史比较文艺学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960 年 1 月 18 日在莫斯科召开的有苏联三大研究所和全国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代表 400 余人参加的“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联系与影响”比较文学讨论会是苏联比较文艺学发展上的一次重要的会议。在会上,日尔蒙斯基作了题为《文学的历史比较研究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

日尔蒙斯基对自己的历史比较文艺学研究进行了总结,并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规律性制约着作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文学的发展的观念,提出了历史比较文艺学的概念和范畴。在报告中,他特别注意阐述了文学方面的类型学的相似和影响问题。他强调指出,类型学的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使我们确定文学发展在其社会制约性中的一般规律性,同时也可以确定作为比较研究对象的文学的民族特征。”他着重指出,影响的社会制约性本身是取决于民族的、社会的和文学的发展的内在规律性的。他把借鉴的形象的社会变形解释为是一种创造性的改造和对于作为互相作用的前提的社会条件、对于民族生活和民族性格的特性的一种适应。(M.Жирмунский 1979: 75)

1967年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第5届国际比较文艺学会议和1970年在法国波尔多举行的第6届国际比较文艺学会议上,日尔蒙斯基分别作了题为《作为国际现象的文学潮流》和《作为比较文艺学对象的中世纪文学》的报告。

在《作为国际现象的文学潮流》的报告中,他指出,割裂历史的具体发展和作家的世界观与风格的体系而单纯经验性地对比大大小小的文学事实,根据其间存在某些外在的,常常是偶然的,有时完全是虚伪的相似性而以之对影响或外在“推动”的机械性理解加以解释。所有这一切都是使所谓“比较方法”一般地受到广泛怀疑的原因。他在报告中阐述了怎样用科学的方法区分类型学的相似和文学的影响。并且提出了克服欧洲中心主义而建立真正的世界文学史的问题。(M.Жирмунский 1979: 137、156)

在《作为比较文艺学对象的中世纪文学》的报告中,日尔蒙斯基指出,欧美国家的现代比较文艺学,原则上和事实上都只是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现象作为研究的对象。而他认为,必须把中世纪文学也纳入世界文学过程的比较研究的总体框架之中。而这这就要求考虑到这一时代所特有的社会历史特征。(M.Жирмунский 1979: 158、172)

1971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了“斯拉夫文学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问题”讨论会,它成为比较文学学科在苏联重振旗鼓和苏联历史比较文艺学派的重新振兴的盛会。经过几十年来苏联学者的努力,苏联历史比较文艺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已经形成。而正是在这一年日尔蒙斯基逝世了。

苏联历史比较文艺学的基本理论体系的建立是和日尔蒙斯基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日尔蒙斯基曾援引舍维列夫的话指出历史比较地研究文学的意义:“一切客体,如果没有其他客体的比较,在其孤立状态下是无论如何不能被确定、被明确的。”而科学研究的趋向正是从简单对比和确定异同,走向对它们进行历史的解释,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上层建筑与基础相互关系的理论,日尔蒙斯基指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过程具有一致性和规律性,这一思想是历史比较地研究各民族文学的基本前提。因为历史发展的共同过程决定着作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文学或艺术的规律性发展。这样,在历史过程的制约性中研究世界各民族文学间相互联系和异同,文学的比较就被置于科学的基础上。

日尔蒙斯基认为,文学现象的相似,一方面可以是社会文化发展进程的相近造成的,由此而产生历史类型的类似,根据这一观点,可以对诸文学现象(体裁、风格、情节、主题、作家、流派……)进行历史比较研究。

另一方面,文学现象上的相似也可以是由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文学的接触、交融所致。而这种联系与影响得以实现的基础则是该社会、该文学中有“输入”这种影响的内在需要,其自身有着类似的发展趋向。同时,影响的实现总是伴随着接受者对于借用因素进行创造性改造,通过具有独特创造个性的作家的运用而接受过来,融会到自己民族文学的传统中。

因此,日尔蒙斯基的历史比较文艺学不仅重视研究各民族、国家文学的相似性的规律,而

且也重视研究其差异性的规律。在这一理论基础上，他深入探讨了过去时代的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东西方文学现象的类型学比较和相互影响，而且用历史比较文艺学方法对民俗学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

## 2 日尔蒙斯基关于历史类型学的观点

日尔蒙斯基指出，在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的同一阶段上，会出现大量类似的文学现象。在没有直接的相互影响和接触的情况下，这种类似的特点可以称之为历史学的类型。

正如受到同一种历史时代相类似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状况的制约而使欧亚许多国家的社会政治关系出现过很多相似的特点一样，在意识形态——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同一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不同民族间，尽管在缺乏直接联系或影响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十分相似的特点。这种历史类型学的相似不仅要比我们想象的多，而且是民族间文学影响的前提。当然，这些历史类型学的相似，还会伴随着各民族社会历史过程的具体特点所造成的各自的重要区别。比较研究这些特点的重要性在于确定在社会制约中的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及各族文学的民族特点，确定由于历史过程的地域性特点，以及这种特点所造成的民族的、历史的独特性所引起各民族文学现象的个别性差异。

作为历史类型学相似的例证，日尔蒙斯基举出在东西方各民族在封建时代基本上没有直接的文学影响的情况下，各自所产生的一些类似的文学现象。如各民族的英雄史诗：中世纪日尔曼语系和拉丁语系民族史诗，俄罗斯人的壮士歌，南斯拉夫人的英雄歌，以及突厥语系和蒙古语系民族的史诗创作等等的相似；又如在 12—13 世纪时法国普罗温斯的行吟诗人的和德国歌唱武士爱情的游唱诗人的骑士抒情诗与稍早一些时候（9—12 世纪）流传在阿拉伯人中的爱情诗歌的相似；再如西方 12—13 世纪流传的诗体骑士小说和 11—13 世纪伊朗语文学中的所谓爱情史诗的相似。

日尔蒙斯基指出，尽管近代文学与中世纪文学相比，体裁方面传统的、典型的、稳定的东西已为更为分化的民族特点和更为个性化的艺术手法所替代，但是，仍然不乏这种历史类型学相似的例子。比如，市民戏剧和家庭小说这种新的体裁的出现几乎是在 18 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时代的英国和法国同时出现的。这是和当时这两国资产阶级的活跃及为其生活利益和艺术趣味服务的文学的产生相联系的，不能认为是影响使然；又如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的产生也可以追溯于同一年代：1798—1800 年，而当时英国和德国的老一代浪漫主义代表几乎还没有个人间的接触。

日尔蒙斯基指出，这种历史类型的相似性特征可以表现在思想和心理内容上，也可以表现在主题情节、艺术形态和艺术境界以及体裁结构、艺术风格特点上。当然，这些历史类型的相似性特点又伴随着各民族、国家社会历史差异而造成重要分歧。

作为一般文学史过程的例证，日尔蒙斯基指出了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各民族文学——社会思潮间相同的、有规律性的一系列演替以及与各种思潮相联系的主要文学艺术流派的更替与斗争。这些流派的类似是可以由这些民族的社会发展条件的类似来解释的。比如，欧洲各民族进入近代社会后出现的各民族文学共有的规律性的文学流派演替：文艺复兴、巴洛克式、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

同时，由于各民族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学传统的差异，这些思潮和流派在不同国度形成和延续的时间是不同的，并且形成不同的民族特色。而在某些文学思潮与流派之间，还可以存在过渡性质的现象。比如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到所谓“前文艺复兴”和“前浪漫主义”。又比如，19 世纪早期批判现实主义代表巴尔扎克、狄更斯、果戈理，他们与浪漫主义紧密相联而不同于后来的福楼拜、萨克雷、托尔斯泰。对这些过渡性现象的比较研究可以揭示出其相似的、合乎历史规律性的特点。日尔蒙斯基又指出，一般文学过程的个别阶段在不同的民族文学中，表现出的典型程度可能是不同的。在有的民族文学中可能表现得经典些，辉煌些，在有的民族文学中可能就表现得弱一些。比如法国和英国 19 世纪的经典现实主义就比德国更强一

些。

在谈到文学现象变化的社会历史原因时，日尔蒙斯基以社会历史对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体裁的制约性为例。他指出，浪漫主义时期历史体裁(历史小说、历史剧)之盛行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历史主义的发展，与重视民族的过去和民族自觉高涨条件下艺术地再现过去的尝试是相联系的。

而抒情戏剧、抒情的(“主观的”，或以自我为中心的)长篇小说这些新的浪漫主义体裁的发展又是与这个剧变时代中个体与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冲突这一重大时代特征相联系的，是与渗透到个人内心世界的个人主义的发展相联系的。

经典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中对当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则推出了当代社会小说这一主导体裁。它推出当代先进的主人公，揭示出生活中的种种冲突和由社会关系所造成的种种心理。

他认为，文学中种种时代性的更演，不能认为是出于国际间文学模式影响的结果或仅仅出于文学形式内在演变的原因。

在指出各民族文学发展相似性的社会历史原因时，日尔蒙斯基强调了民族、阶级的差异性。他指出马克思把浪漫主义视为对法国革命和与之相联系的启蒙运动的第一个反响。不过，这一“反响”在不同的社会阶级、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民族那里是各不相同的。这也就是浪漫主义文学具有形式上多样化和呈现出五光十色的特征的原因。

日尔蒙斯基还指出，东方诸大民族的文学在中世纪是走在欧洲文学之前的，由于长期处于封建社会而没有进入如欧洲一样的文学过程。如今他们的民族复兴而带来的社会领域和文学领域的飞跃，使他们有可能利用先进文学的经验，他认为，他们不必再简单地重复欧洲所经历的所有文学阶段。

### 3 日尔蒙斯基关于国际间文学影响的论述

正是在文学发展的规律受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性制约这一基本前提下，日尔蒙斯基进一步指出文学过程的历史类型的吻合总是和国际性的文学相互影响作用错综交叉在一起的。因为他认为，人类社会历史上不存在个别部分之间没有相互影响而绝对孤立发展的例子。一个民族的文化愈发展，他和其他民族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就愈密切。这种相互影响、作用的最一般的情况就是，在社会发展中走在其他民族前边的民族比较进步的文学对于社会关系比较落后的民族文学的影响。比如在近代的欧洲，可以勾画出文学影响的显明的连续性，在某一历史阶段处于社会发展先进地区的国家轮次成为这种影响的策源地。15—16 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17 世纪法国的古典主义，18 世纪英法的资产阶级启蒙文学运动，19 世纪法英的批判现实主义就都曾受到过这种国际性的影响。

同时，日尔蒙斯基又指出，这种规律不是绝对的，比如 19 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所产生的国际性影响，就是与革命前俄国社会发展的水平不相称的。这是和 19 世纪俄国社会解放运动的高涨、社会人道主义的高涨相联系的。

在文学影响的问题上，日尔蒙斯基反对片面的、直线性的理解。他提出所谓反向的(обратный)，乃至反动的影响的可能性。他举出现代派(他认为这是“帝国主义时代文学颓废思想的产物”)所具有的世界影响。他又举出西班牙和意大利在封建化复苏和天主教反动时代对欧洲文学的影响(这是与欧洲 17 世纪巴洛克风格问题相联系的)。所以他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把文学风格流派想象成为一个统一的流脉是不正确的。应该研究存在于文学过程每一阶段的社会矛盾和斗争的复杂性。

日尔蒙斯基还探讨了对过去的经典作家及其文学遗产的接受问题。他认为，不能认为过去时代的经典作家的影响仅限于和他有着同样社会基础的文学范围。否则，就不能理解莎士比亚对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流派作家的深刻影响。日尔蒙斯基指出，那些属于不同文学流派、不同社会集团的作家可以从以往伟大的经典作家的丰厚的遗产中，按其不同的历史时代，找

到某些合乎他们要求，能为他们解决某些迫切的创作问题所必需的东西。

当然，对过去遗产的创造性认识不是没有限度的，其极限在于这些经典作家作品本身客观的、被历史制约的特点中。而在超出思想和艺术上相近的界限方面，就会对之产生冷淡，甚至排斥。

根据上述的国际间文学相互联系和影响的理论原则，日尔蒙斯基进一步讨论了有关研究文学间影响的一些方法论方面的问题。

首先，影响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不是单纯来自外部的机械性推动力的结果，而是有规律性的，受社会制约的。这一制约性取决于前一时期民族、社会、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为使影响成为可能，就必须存在着对这种输入的要求，必须在该社会中、该文学中存在着多少已在形成的类似的发展趋向。他在这里引用了维谢洛夫斯基的所谓“迎汇的潮流”的概念。在一民族内部，这种“迎汇的潮流”的存在，在很多情况下也使确定有否影响成为难题。比如18世纪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文学中的市民戏剧和家庭小说这些体裁的产生。正如一些法国研究者认为的，起码在这些体裁发展的初期，应该从民族文学的传统中，而不是从英国的输入中来探讨其渊源。而另一方面，如晚期的狄德罗的市民戏剧及其理论，就已经清楚地表现出受到英国作为一个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

因此，历史类型的类似和文学的相互影响是辩证地相互联系的，在文学发展过程中，应视为同一历史现象的两个方面。

其次，任何文学影响中都存在被借用的形象的社会性变形。我们应把这种变形视为适应社会条件(民族性格、文学传统、作为借鉴主体的作家个体)对所借鉴的形象进行的创造性改造。

日尔蒙斯基援引马克思的举例说，17世纪法国戏剧“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而在达西埃和其他人向他们正确解释了亚里斯多德以后，他们还是长期地坚持这种所谓的‘古典’戏剧”。

日尔蒙斯基还例举出18世纪英国人弥尔顿(1608—1674)以《圣经》为题材的长诗《失乐园》对德国市民文学的影响——出现了克洛卜施托克<sup>①</sup>的同一题材的宗教长诗《救世主》。而弥尔顿笔下具有清教徒英勇的革命精神的撒旦的悲剧形象已经变为基督这一不抵抗主义的英雄的抒情形象。他的全部伟大在于温柔地忍受不可避免的苦难。日尔蒙斯基认为，弥尔顿的基督教史诗在18世纪德国文学土壤上的变形，这种文学影响中的变形鲜明地表现出两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区别：即17世纪英国清教运动作为革命资产阶级战斗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无力的德国市民阶层感伤地陷于对内心抒情感受的内省观照的虔敬主义。

最后，在谈到与研究国际间文学相互影响相联系的最广泛的问题——传统和“影响”在意识形态发展中的一般作用时，日尔蒙斯基批判了庸俗社会学的观点，指出意识形态发展的相对独立性。

他认为，特定时代和社会倾向的文学都不是在空地上产生的，而是在与现存意识形态(包括文学)传统相互影响的复杂过程中产生的。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反映，绝非是消极的复写，其特性是在作家的社会意识的历史性制约下形成的；是由国际的、特别是民族的文学传统决定的；是在社会历史和文学的发展过程的统一性、规律性之中、在各个局部的经常联系和交合作用下形成的。

因此，文学中的任何一种思想斗争都同时表现为与现存的文学传统的斗争，表现为它进一步的发展、形态变化和局部或全部的战胜传统。因而，把作家的创作与民族的和国际性的文学传统加以比较，与影响过该作家的前辈和同时代人加以比较，以确定他们之间由历史制约所造成的异同，是具有重大方法论意义的。正是凭借这种比较，才能认清作家的创作独立性和他在民族和世界的文学共同发展中的地位。

日尔蒙斯基指出，文学的潮流是一种国际的现象。他反对旧比较文艺学往往夸大民族间个别作家的偶然性的“相遇”，而将其视为影响文学发展的基本因素。他以司格特历史小说和拜

伦抒情诗的国际影响的经典事例证明,这类文学影响的每一个个别性的事实都应该纳入总的国际文学过程中,才能获得其社会历史的和文学自身发展上的解释。

日尔蒙斯基正是把文学过程作为整个社会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来理解其统一性和规律性的。他认为基于这一思想,才有可能建构总体文学,揭示其特殊的规律性。由此,他提出,真正的总体文学应当克服西方传统文艺学的欧洲中心主义,必须使古典的和当代的东方文学,亚非文学在宽广的历史图景上找到自己相当的位置。他指出,对欧洲文学的历史的研究要求更加深入地了解东方古典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因为他们当时在总的文化发展上是走在欧洲前面的。

#### 4 民间文学方面的历史比较研究

在对历史比较文艺学进行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日尔蒙斯基把历史比较文艺学的方法运用于民间文学的研究,并获得了卓越的成就。他对民间文学的研究,涉及到一系列基本和迫切的问题,如各民族、各历史时代民间文学主题情节相似的原因和性质,各民族间民间创作的发展规律和文体形式的共同性和统一性;民间文学领域中民族间接触的性质与特点,一般文学在民间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异族包围中的个别民族群体的民间文学的命运;各民族的诗学的共性与个性等。

日尔蒙斯基否定了旧形式主义的比较文学的方法,指出他们往往是无原则地在纯粹是外在的相似性的基础上,对比一个个民俗学上的事例,而不考虑形成影响关系的具体历史的和文学发展特殊性的前提,不考虑对所借鉴的“形象”的加工改造的社会制约性。他认为,所有这些都造成人们对比较文艺学的怀疑态度。

日尔蒙斯基将历史比较文艺学的理论运用于民间文学的研究,奠定了民间文学比较研究的新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在关于英雄史诗、叙事诗、童话等体裁的发展史的著作中,他有成效地运用了这些方法。他指出民俗学研究的3种比较方法:1、史类型学的比较,即从社会发展条件的相似性来解释在发生学上没有相互联系的文学现象的相似性;2、史起源比较:即考察民俗学现象间发生上的亲缘性及其之后分化演变的历史原因;3、基于民族间历史的相似性及其社会发展的前提,来确认国际间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或借鉴关系。他指出,这3种比较研究的方法是既有联系又有差别的。

而日尔蒙斯基特别注重历史类型学的理论原则在民间文学研究上的作用。因为它的前提就是他所主张的历史比较文艺学的基本理论——历史发展过程的统一性和规律性,及其在同一社会发展阶段中文学艺术发展的相似性。他认为,民间文学中形象、主题的社会历史内容及其和社会现实本身的变化相联系的演变,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这些问题,应该依循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过程及其在民间创作中的反映的思想加以研究。

所以,日尔蒙斯基指出,存在基于社会发展相似性上的民俗学现象中的类型学相似性,这一点并没有取消在民俗学上国际间相互作用的问题。恰恰相反,社会情况的相似正是这类相互作用的前提条件,是发生方式上的补充因素。因为在实际的历史环境中,从来不存在绝对孤立的文化发展。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他努力寻找研究借用和接触联系问题的新途径。比如说,日尔蒙斯基关于“游动情节”的论述,就贯穿了这种求索精神。他的出发点是:接触联系是有自身规律性的,实质上是历史类型性联系的特殊表现形式。许多的所谓游动情节,从根本上说,起源于各种古老的关系,古老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典礼仪式等等。它们的产生及其性质也是受类型制约的。后来,这类情节失去了与这个或那个民族实体的直接联系,开始从这一民族传到那一民族。而这种传统本身和在新环境中被掌握并发生变异的过程,也是服从历史类型规律和整个民间创作的更为深广的进程的规律的。

因此,日尔蒙斯基既承认在某些场合存在着“借用”的可能性,但是又把主要注意力用来论证它们的相似性具有历史类型的性质。他认为这种相似性首先起源于社会生活和文化的相似现象;其次是对过去的民间文学传统的继承性,它决定着情节联系的稳定性。

日尔蒙斯基认为民间文学的相似情节中存在着类型的相似或是接触性的相互作用，这首先乃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应该考虑到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和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作用。在历史过程的各个阶段，各种民间文学体裁对于各民族间的影响，表现出各不相同的“渗透性”。比如人民的英雄史诗一般说来是最少受到国际影响渗透的，因为它是被人民的英雄主义理想化了的自己民族的历史，因此它不易“游走”而较少能从别的民族借用情节和形象；而民间故事的情节却具有国际性。因为它没有直接的民族、历史、地理上的依存关系，而且，其散文形式也易于从一种语言转述为另一种语言，易于创造性地进行适合该民族环境的情调上的改造。

比如，欧洲和亚洲的很多民间故事(神话的、动作的、趣闻轶事的)的情节都具有国际性，如《穿靴子的猫》、《睡美人》、《灰姑娘》三个愿望的故事……而像伊万王子、大灰狼这类故事，在俄语、德语和乌兹别克语的文本中情节的发展很难说有内在的逻辑。因为这些故事中的一些细节，像一系列没有内在逻辑必然性的连续的奇遇彼此衔接贯穿，可以轻易地删掉或改动一些情节而并不损害故事的全局。所以也可以断言，如在灰姑娘的民间故事中，关于凶恶的后娘及其女儿们虐待年幼的前妻之女的共同主题，或是死去的母亲相助的情节，或是更古老的说法——长在母亲坟头上的树或奇异的动物(图腾祖先)的帮助的情节，它们也可以用社会关系、风习信仰的相似性加以解释。它们可能互不依赖地存在于极不相同的民族的民间故事中。

日尔蒙斯基指出，民间故事通过借用从一个民族转入另一民族，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忽视这一事实致使有些民间故事的研究者不去考虑很多民间故事情节的国际性，而每每把实际上是国际性的民间故事财产认作是民族特殊性的特征。同时，也正是对某一国际性的民间故事情节的各民族间的各不相同的变体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分明地确认这些民间故事在各民族中的变体所表现出的独特性。而正是这种在风俗习惯、社会关系及民族思想形态上特殊的民族性内容，在特定方向上使传统的国际性情节模式得到补充和变形，从而使这一民间故事变为该民族的文化财产。

这样，日尔蒙斯基把类型学理论与影响流传的研究相统一，力求科学地解释民间故事的产生、发展、流变的规律。

在民俗学的领域中，他同样反对欧洲中心主义而把研究的眼光投向全世界各民族文化。他援引大量的研究成果指出，大多数童话，起码是神话的故乡，很可能正是在近东和中东，它们从那里承袭了神话的色调和大量非西方所有的民俗主题。他在谈到阿尔内<sup>②</sup>的索引时，指出这一索引所建构的童话体系的统一性，反映着在漫长的接触中历史形成的一定的文化区域的共同性。因而它也就有着历史地形成的界限。超出这一界限，这一体系就不再适用。他指出，不应该继续把那些新发现的题材仅仅作为旧的欧洲索引的附录和补充，而应该在当今引起广泛关注的民族童话中寻找其自身题材结构上的规律性。而新的索引应该建立在更新、更合理的童话体系基础上。

日尔蒙斯基正是在他的历史比较文艺学思想的基础上，重新提出维谢洛夫斯基关于建立总体文学的思想。日尔蒙斯基认为，只有把文学过程作为整个社会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来理解其统一性和规律性，才有可能建构总体文学，揭示其特殊的规律性。由此，他提出，真正的总体文学应当克服西方传统文艺学的欧洲中心主义，必须使古典的和当代的东方文学，亚非文学在宽广的历史图景上找到自己相当的位置。他指出，对欧洲文学历史的研究要求更加深入地了解东方古典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因为他们当时在总的文化发展上是走在欧洲前面的。

在对比苏联历史比较文艺学和当今西方的比较文学时，日尔蒙斯基指出，西方比较文学的一个缺点就在于它和一般文艺学相分割。这种分裂的结果是否定了历史的乃至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使总体文学变为各民族文学的个别现象的简单集合，把各民族间的文学联系和相互



影响变为各国作家之间的一系列偶然经验性的“相遇”。而马克思主义关于全部人类历史(因此也包括文学)过程的统一性和规律性的法则第一次使总体历史以及总体文学史的历史建构成为可能。苏联的历史比较文艺学正是以此为武器,为建构真正的总体文学体系探索着道路。

#### 附注

①克洛卜施托克(1724-1803)德国启蒙运动诗人。

②阿尔内(1867-1925)芬兰民间文学研究家,提出民间文学作品的比较分析和分类方法,编有《童话人物索引》(1910)。

#### 参考文献

[1]Веселовский. А.Н 1940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оэтика [M].Ленинград.

[2]Жирмунский В. 1979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M]. Ленинград.

## Zhermumsky's Research of th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U Ze-lin

(Foreign Language Dept, BNU.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 Zhermumsky is the founder of the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of Russia. The study scale of this essay include the process of Zhermumsky's theoretical probe, his opinion of History Typology and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Literary and his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Comparative on folk literature.

**Key words** : Zhermumsky; histo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istory typology

收稿日期: 2003-08-02

作者简介: 吴泽霖(1948—),男,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从事俄苏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 刘 锟]